

# 论 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著的宋玉书写

## ——从断代文学史到文学通史的考察

何新文<sup>1</sup>, 张家国<sup>1,2</sup>

(1. 湖北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2. 湖南怀化学院 教育科学系, 湖南 怀化 418008)

**摘要:** 宋玉在古代常与屈原并称为“屈宋”,但在 20 世纪以来的文学史著中并没有取得相应的书写地位,大多数断代或通史类的文学史都是在屈原或楚辞的专章内附论宋玉。这种现象的形成,既受制于文学史家“宋不如屈”的主观认识,更与今传宋玉赋的真实性长期受到怀疑相关。自上世纪后期“唐勒赋”残简发现之后,宋玉赋的真伪得到重新审视,诸如赵明、蔡靖泉、方铭所编文学史著,皆以专章详论宋玉开创赋体之功并充分肯定其文学史地位。从而不仅开始改变轻视宋玉的学术偏见,也对当时及此后文学史著的宋玉书写及其科学评价产生积极影响;当然,所留下的问题也仍然值得继续探讨和深入。

**关键词:** 宋玉;20 世纪;文学史书写;《文选》;赋

**中图分类号:** I207.4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2015)06-0117-07

宋玉是继屈原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富有开创性的赋家。在古代中国,“屈宋”并称常常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在自 20 世纪初期至今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宋玉并没有取得与屈原齐名并称的书写地位。长期以来,绝大多数断代或通史类的文学史著作,一般都列有“屈原”或题为“屈原与楚辞”的专章充分论述屈原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而“宋玉”则往往只是作为其中的一节附带论及。这种情形先后延续了近百年之久,直至上世纪末才开始有所改变。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这种现象,为什么长期以来宋玉并未得到文学史家应有的重视?今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应该有怎样的宋玉书写?显然,这都是值

得今天的宋玉研究者和文学史家认真总结和深入讨论的问题。

### 一、20 世纪以来文学史著作的宋玉书写及其成因分析

如果从 1910 年公开出版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所编的《中国文学史》算起,“中国文学史”撰写的历史,已有一百余年。这百余年间,国内外出版问世的各类中国文学史著作不下数百上千种,但它们对于屈原、宋玉的书写,无论是论述篇幅,还是评价高下,均有很大的不同。现仅据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sup>[1]</sup>吉平等《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sup>[2]</sup>等书目著录,以及笔者所研读的约近三百种 1910—2014 年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关于屈原与宋玉

**作者简介:** 何新文(1953—),男,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家国(1973—),男,湖北大学文学院 2014 级博士研究生,湖南怀化学院教育科学系讲师。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康达维与《文选》赋研究”。

表 1 20 世纪以来近三百种断代与通史型中国文学史著作宋玉书写情况统计表

年代	在屈原或楚辞专章(节) 内附论宋玉	合屈原与宋玉 为专章(节)	列专门章(节) 叙论宋玉辞赋	文学史著 合计
1910-1948	断代 2/通史 50	断代 1/通史 2	断代 1/	断代 4/通史 132
1950-1979	/通史 29			通史 37
1980-2000	断代 6/通史 71		断代 6/通史 1	断代 11/通史 74
2001-2014	断代 1/通史 24	/通史 1	断代 1/通史 2	断代 2/通史 27
小计(种)	断代 9/通史 174	断代 1/通史 3	断代 8/通史 3	断代 17/通史 270

的书写情况列简表如后:

在上表所列 287 种文学史著作(其中断代或区域性史著 17 种,通史类著作 270 种),可知明确标明有论述屈宋辞赋章节者为 197 种。这 197 种文学史著作,有 183 种在“屈原”、“楚辞”或“屈原与楚辞”等相关章(节)内附论宋玉,所占比例为 92.8%;有 4 种是合论“屈原及宋玉”,占比为 2%;专列“宋玉”(或“宋玉与其他”)专门章(节)的有 10 种,占比为 5%,而这 10 种中又只有 1 种断代史是 1979 年前出版的,也就是说,20 世纪前 80 年文学史著作的宋玉书写,几乎全是在屈原和楚辞的名义下附带论及的。

那么,在古代中国时常被“屈宋”并称的宋玉,为什么进入 20 世纪后反而长期得不到文学史家的相应重视呢?这其间的原因是复杂的,但笔者通过研读这些文学史著后发现,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应该是最基本的原因:

首先,大多数文学史的编著者从主观上并不认可所谓“屈宋并称”。如继 1955 年郭沫若在《新建设》2 月号上发表《关于宋玉》一文,说封建时代“屈宋并称”是出于封建文人的“偏见”之后,1963 年出版的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就认为“过去屈宋并称,宋固不如屈。”<sup>[3](p95)</sup>1983 年,姜书阁指出古人“屈宋”并称“当然不一定都正确”,因为“无论就屈、宋二人的立身行事而言,或就其文章辞赋而论,宋玉都不能与屈原并驾齐驱,故亦未可等量齐观”;<sup>[4](p109-110)</sup>次年姜先生于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中阐述过同样的观点,谓宋玉与屈原“大不相同,未可等量齐观、给予同样评价而并称之”。<sup>[5](p39-40)</sup>本着这样的认识,文学史家对于宋玉当然不可能有与屈原近于“等量齐观”的书写和评价。

其次,是对于今传大多数署名“宋玉”赋的真实性的怀疑。关于宋玉作品的载录,古代文献有两种情形:一是书目著录,如《汉书·艺文志》著录“宋玉赋十六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宋玉集》三卷”;二是文章总集刊载其辞赋,如王逸《楚辞章句》收有《九辨》和《招魂》2 篇,萧统《文选》收有《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 5 篇,《古文苑》收有《讽赋》《钓赋》等 6 篇。古今学人对于书目著录宋玉作品的篇、卷数一般都信而不疑,而对于《文选》《古文苑》等总集所载署名“宋玉”赋的真实性就颇多怀疑。

20 世纪前期的文学史著,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为除《九辨》、《招魂》外,“自《风赋》以下便都有些靠不住。”<sup>[6](p65)</sup>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也都只认可《九辨》一篇。解放后通行的文学史著作,如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认为除《九辨》外,其余《文选》《古文苑》所载 11 篇“都是后人所依托”;<sup>[3](p94)</sup>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只认可《九辨》、《招魂》及《文选》所载的 4 赋;<sup>[7](p99)</sup>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只认同《九辨》及《文选》所载的 5 篇。<sup>[8](p121)</sup>被认为可信的作品有限,文学史家关于宋玉的书写当然就不会有太多的篇幅,更遑论所谓“屈宋并称”了。

此外,肯定还会有别的原因。比如怎样看待屈宋本身的文学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就很难有整齐划一的意见;文学史家既会因主观标准和喜好的不同而存在“见仁见智”的评价差异,而且在这个问题上,断代文学史与文学通史的判断也有不同。

## 二、断代及地域性文学史对宋玉书写的坚持与突破

现当代的断代或地域性文学史著作,笔者所可见且列入上《表1》的有17种:包括先秦文学史7种、战国文学史2种、先秦至汉魏六朝文学史6种、湖北或楚国文学史2种。

这17种文学史,对于宋玉均有不同程度的论述和评价,表明了对于宋玉书写的普遍认可和坚持。其中,除有9种是在“屈原与楚辞”或“楚辞与屈原”等相关章节内附论宋玉之外,其余8种都是将屈原和宋玉各设专门章节或直接以“屈原及宋玉”命题予以论述书写的,所占比例为47%,远高于包括文学通史在内的7%的平均值。这八种以专章书写宋玉的文学史著作是:

游国恩《先秦文学》,第十五章“宋玉及其他作者”(1934)<sup>[1]p135</sup>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屈原及宋玉”(1941)<sup>[9]</sup>

赵明主编《先秦大文学史》,第五章“宋玉其人及其作品”(1993)<sup>[10]</sup>

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第六章第九节“宋玉之辞赋”(1994)<sup>[11]</sup>

蔡靖泉《楚文学史》,第七章“楚辞流衍:宋玉辞赋及其他”(1996)<sup>[12]</sup>

方铭《战国文学史》,第六章“宋玉及战国赋体文学”(1996版)<sup>[13]</sup>

褚斌杰等《先秦文学史》,第21章“宋玉和其他楚辞作家”(1998)<sup>[14]</sup>

方铭《战国文学史论》,第七章“宋玉及战国赋体文学”(2008)<sup>[15]</sup>

上述八种文学史中,游国恩《先秦文学》有可能是首开风气,最早将“宋玉”与“屈原”(第十四章)并列在两章的断代文学史。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四篇标题在屈原与宋玉之间着一“及”字,仍似有附论宋玉之意在,故书中称屈原“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并引刘勰“惊采绝艳、难于并能”之语,而认为宋玉之徒“虽学屈原之文辞,而‘九死未悔’之概失矣”,其今存辞赋作品也“殆多后人拟作”。<sup>[9]p20-25</sup>

引人注目的是,在游国恩、鲁迅两种断代文学史问世半个世纪后的1993—1998的五年之间,竟集中出现了赵明、聂石樵、蔡靖泉、方铭、褚斌杰等人主编的5种断代或区域性文学史,都以专门章

(节)书写宋玉。这是20世纪以来前所未见的现象。这些文学史著之所以能对于宋玉有与众不同的重视和书写,究其原因,则正好与那些不能正确对待宋玉的文学史家相反,他们对于宋玉在文学史上重要地位的认识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第一,增加了对《文选》及《古文苑》所载宋玉赋的认同。

学术界对于今传宋玉赋的质疑古已有之。但自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唐勒赋”残简,经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第壹号之《简介》披露,再由罗福颐《临沂汉简所见古籍概略》、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谭家健《唐勒赋残篇考及其他》、李学勤《唐勒、小言赋和易传》等文著的研究释文,考定这篇250余字的赋为宋玉或唐勒所撰之后,当时的宋玉研究者大多重新认定《文选》及《古文苑》所载十余篇署名“宋玉”的赋都应是真实可信的。

于是,1990年代出版的上述几种断代文学史大都吸取了宋玉赋真伪之辨的最新学术成果。如蔡靖泉《楚文学史》以“唐勒赋”就是典型散体文赋为由,印证《文选》所载5篇赋“确为宋玉所作”;<sup>[12]p466</sup>褚斌杰1983年版《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文学史纲要》,曾在“屈原和楚辞”章内附论“宋玉”可征信的作品“《九辩》一篇”,而十五年之后再主编的《先秦文学史》,则不仅并列宋玉与屈原两个专章,而且将宋玉具有“可靠性和重要性”的作品扩大到了《文选》所载《风赋》《高唐》和《神女》等赋;<sup>[14]p479</sup>方铭《战国文学史》以及后来修订新版之《战国文学史论》,更认为《文选》和《古文苑》所载宋玉诸赋大多可信。

第二,从创新“赋体”的角度重估宋玉的贡献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如果文学史家只局限于从“楚辞”的角度论述宋玉之时,就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宋玉至于屈原的从属地位,并在“屈原”或“楚辞”的名义下附论宋玉。故徐北文《先秦文学史》,在“楚辞与屈原”章内列一节论“楚辞流派的变迁与宋玉”;<sup>[16]p214</sup>王齐洲等著《湖北文学史》,也同样在“楚辞与屈原”章内列一节论“宋玉和其他楚辞作家”。<sup>[17]p112</sup>

而前述1990年代出版的这几种断代文学史,则大都注意到了宋玉与屈原的不同之处,是在于他

于楚辞之外创新了“赋体”。其中,如赵明主编《先秦大文学史》,由罗漫执笔的第五章“宋玉其人及其作品”,用五节的篇幅详论“宋玉其人及其作品的真伪”,肯定“宋玉文学的独创性”和“宋玉的文学史地位”,尤其高度评价宋玉在文学史上领导了“赋体文学”的“第一次浪潮”,创造了有别于屈原作品的象征符号;<sup>[10](p492-539)</sup>蔡靖泉《楚文学史》,既在第七章标题中点出“宋玉辞赋”以区别第六章的“屈骚”,又在具体的论述中强调“宋玉所创造的赋这一新文学样式,在楚文学史及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并指出宋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示美以悦目、见丽以赏心而作”,故“在文学之为‘文学’这一审美创造的具体方面,甚至有超过屈原的出蓝之处。”<sup>[12](p481-483)</sup>

方铭的《战国文学史》,更自觉地选择了“文体”比较的视角。古代学者,如清章学诚《诗教》曾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又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sup>[18](p60)</sup>方铭论战国文学史,亦十分重视“文体”的区分。他不仅在书中专列一节论战国“文学体裁及流派”,主张“楚辞”与“赋”为“两种体裁”,“屈原之辞属抒情诗,荀子宋玉等赋别为一种文学样式”;而且全书内容的主体布局也依文体分别为“论说体”、“叙事体”、“抒情体”和“赋体”等四章,有意将“宋玉及战国赋体文学”与“屈原及战国抒情体文学”相提并论,并且高度评价“宋玉、荀况开赋文学之新形式”的“意义是巨大的”。<sup>[13](p104-454)</sup>

褚斌杰等《先秦文学史》,虽然标题仍是“宋玉和其他楚辞作家”,但论述重点已经放在宋玉诸“赋体作品”之上。对于宋玉的评价,也由十五年前所著《先秦秦汉文学史纲要》中“屈原以后重要的楚辞作家”,改称为“我国文学史上赋体文学的开创者”。<sup>[14](p486)</sup>

### 三、在文学通史中列入“宋玉”专章的创新意义

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宋玉书写的情况,与断代史著颇不相同。如《表1》所示,自1910至1979年70年间出版的一百六十余种《中国文学史》通史著作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屈原”、“楚辞”或“屈原与楚辞”等相关章(节)内附论宋玉的。将宋玉与屈原并列同一章(节)的只有4种,即1928年版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的“屈原和宋玉”章,1943年版田鸣岐《历代文学小史》的“屈原和宋玉贾谊”章,1935年版张希之《中国文学流变史论》在“楚辞”专章内的“楚

辞重要作家屈原与宋玉”一节,1939年钱基博所撰作为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材印行的《中国文学史》“先秦”章内的第六节“屈原、宋玉”;<sup>[19](p36-39)</sup>此外,1936年版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则在第二章第二节内列“屈原及其作品”与“宋玉景差唐勒”<sup>[20](p117-186)</sup>两小节。而未见这七十年间有将宋玉与屈原一样并列列为专章论述者。

即便是在宋玉赋真伪考辨取得新的进展,多种断代文学史著纷纷专章详论宋玉辞赋的1990年代以至而今,大多数文学通史著作仍然是在“屈原”或“楚辞”等相关专章内附论“宋玉”,诸如罗宗强、陈红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南开大学2003年版)、欧阳楨人编《中国古代文学史教程》(北京大学2007年版)、北师大文学院编《中国文学史》(北师大2008年版)、姚莫中《中国古代文学史讲稿》(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等,均是如此。其中,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还是在“屈原与楚辞”章之“楚辞的流变与屈原的地位”一节内用不足两千字的篇幅概论宋玉,“宋玉”的名字尚未出现在章节标题之中。

如上所述,可知20世纪以来的文学通史对于宋玉的重视程度及书写篇幅,总体上与断代文学史又有差距。这或许是因为通代史与断代史的容量及具体作家在所处时代与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原本就有不同相关。比如,某个作者在其时代算得上是有成绩的作家(例秦代的李斯及其《谏逐客书》),但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上就可能不算突出。再者,文学史家对被叙述对象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如游国恩原来在《先秦文学》中并列“屈原”与“宋玉及其他作者”两章,后来主编《中国文学史》,则将“宋玉”附在《爱国诗人屈原和楚辞》章内用一节论述。这一变化,当表明游先生认为宋玉在先秦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整个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则不如屈原。

值得欣慰的是,在新、旧世纪之交的十多年间,文学通史对于宋玉的书写也终于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先是1997年,张炯等的《中华文学通史》出版,其“先秦秦汉文学”编内列入第八章“宋玉及其他楚辞作家”,而与第七章“爱国诗人屈原”并列。虽然该书专论宋玉的文字仍只有“悲秋之祖宋玉”<sup>[21](p122-126)</sup>

一节,重点叙论的作品还是《九辩》,对于《风赋》及《高唐》《神女》诸赋的介绍尚不足千字的篇幅。但此书发凡起例的专章书写宋玉,对于文学通史确有开风气之功。此后十有余年,张炯等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也同样并列有与上书一致的两个专章。

接下去,便相继出现了另外两部文学通史新著: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发展史》和方铭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笔者看到,2003年版的《中华文学发展史》(上世史)中的关于屈、宋的两章均由方铭负责撰写。故与其《战国文学史》一样,此书仍然注意“辞与赋的区别”,认为宋玉的文学成就主要“来自于赋”。<sup>[22](p178)</sup>于是,他在第八章专论“宋玉等人与赋文学”,而与上述张炯主编的两部文学史均从“楚辞”角度书写宋玉有所不同。还因为该书的编辑目的是“为向广大文学爱好者和大、中学生推广中国文学史知识”(《中华文学发展史·前言》),故对于宋玉赋只是重点分析了篇中寓意和特点,并没有详细地论辨宋玉赋的真伪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地位。

而2013年版由方铭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于宋玉的书写,则可谓后来居上。该书“先秦编”分为八章,主体内容大致按照诗、文、辞、赋的顺序排列,其中第六、第七章分别为“屈原及战国骚体文学”和“宋玉及战国赋体文学”。这样的思路结构与章节安排,将宋玉与屈原、“赋体”与“骚体”并驾齐驱、相对而言,就已然提升了宋玉的文学地位。

而该书在刘刚教授具体撰写的第七章里,也可见出不少新的特点:一是总结清理了长期以来考辨宋玉赋真伪的学术成果。著者先立“战国赋体文学的产生及真伪问题”一节,概述古今学者关于宋玉作品真伪的争辩,自南宋明清质疑《古文苑》及《文选补遗》所收宋玉赋,至现代进而怀疑《文选》所载诸篇,再到《唐勒赋》出土之后,绝大多数学者有了比较一致的认识,即认为《楚辞》《文选》收录7篇以及《古文苑》收录的四赋“为宋玉所作”;<sup>[23](p199)</sup>二是对宋玉生平经历的较详细介绍。著者历引古代文献及现当代的考辨成果,叙论宋玉为“楚鄢郢(今湖北宜城)人,其辞赋创作活动大约在屈原逝世之后楚国由衰至亡的数十年间”,又谓“宋玉为人耿介,具有

爱国爱民的情怀,是‘立身本高洁’的正直文人”;<sup>[24]</sup>三是具体论析了宋玉赋的艺术特色及成就。该书以认可11篇辞赋为前提,将宋玉的文学成就全面概括为四个方面:(1)师范屈原,以卓越的辞赋创作成为楚辞文学的优秀继承者,赢得了与屈原并称的文学史地位;(2)创立了与屈、荀辞赋不同体制的散体赋,在文体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3)奠定了散体赋的文体特征与基本写作规范;(4)创造了许多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形象,如《九辩》的悲秋描写,《高唐赋》的山水描摹,《神女赋》的神女刻画,《风赋》的雌雄之风比喻,《对楚王问》中“阳春白雪”的音乐铺排等等。在此基础上,再以第四、五两节具体论析了宋玉“骚体赋”和“散体赋”的写作特点。

#### 四、关于文学史宋玉书写有关问题的讨论

20世纪以来文学史著作的宋玉书写,虽历经七、八十年之久附论于屈原的轻视与偏颇,却终于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了部分纠正,如赵明、蔡靖泉、张炯、方铭等主编的几种断代或通代的文学史著,皆以较大篇幅详论宋玉开创赋体的贡献和高度评价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影响。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从总体上看,宋玉远未得到文学史界的普遍重视;从宋玉书写本身而言,也仍然留有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学术空间。

(一)关于宋玉赋作真伪的考辨尚须继续深入。

这是一个既影响到如何论述宋玉文学地位却又十分复杂费解的学术难题,即便是在上世纪后期“唐勒赋”残简发现并得到探讨考释之后,以专章书写宋玉的文学史著作对此所持的态度也是不一致的。如蔡靖泉《楚文学史》对《古文苑》和《广文选》所收宋玉赋采取“存疑不论”的态度;<sup>[12](p466)</sup>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对于《文选》所载《对楚王问》和《古文苑》所载六篇仍然怀疑“非宋玉所作”。<sup>[21](p122)</sup>诚然,方铭所著《战国文学史》及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认为《唐勒赋》的出土可证战国末期已存在赋体文学,从而认可《文选》所载5篇和《古文苑》所载4赋为宋玉所作。但笔者以为,如此推论仍然不足以说明《文选》和《古文苑》所载“宋玉赋”为何在两汉魏晋五、六百年间的各类文献中不见踪影?这原本是一个有趣却难解的问题,为此,笔者曾有过这样的猜测:《汉志》著录“宋玉赋十六篇”,说明这些赋在

此前确已流传过。是否因为自司马迁谓其“莫敢直谏”、看低宋玉而不将其赋载在《史记》以后,再加上扬雄、刘向父子《诗赋略》、班固《汉书·艺文志》,一直至西晋皇甫谧、挚虞等人,皆以“没其讽喻之义”或“淫”、“侈丽”、“淫文”、“言过于实”、“淫浮之病”一类的语言贬斥宋玉赋,使宋玉赋在汉晋时代并没有获得主流舆论的认可,其影响负面,故作品流传未广;只是到了齐梁,由于沈约、任昉、刘勰、萧统等人的推赏,原来隐伏的宋玉赋才重见天日?当然,这个“猜测”也没有证明,这是后话。但可以明确的是,关于宋玉赋真伪问题的探讨考辨并没有结束。

(二)宋玉赋对汉赋形成发展的影响尚待有说服力的内在证明。

比如说,若要论述屈原思想、精神及其作品对于汉代的影响,则不仅可以举出贾谊亲临湘水敬吊屈原并作《吊屈原赋》,汉武爱《骚》而使淮南王作《离骚传》,司马迁列《屈原列传》于《史记》之内,扬雄撰有《反离骚》、《广骚》及《畔牢愁》,刘向、王逸作录屈原作品为主的《楚辞章句》,班固注《离骚》且撰《离骚叙》;还有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王逸《九思》等一系列以悼念屈原为主题的“九体”作品,贾逵、马融等人的《离骚》注,如此等等。而有文学史和宋玉研究者的文著,称述宋玉对于汉赋形成发展的贡献和影响,但却很少有能从汉赋接受角度提出令人信服的论证。

(三)所谓“屈宋并称”的评价仍然值得论证和斟酌。

诸专章书写宋玉的文学史差不多都肯定自古有之的“屈宋并称”,并借此推论宋玉“与屈原并称的文学史地位”。其实,这样的判断,亦有可议之处:一是宋玉并非“一向与屈原并称”。事实上,自汉至晋的辞赋批评家大多持着是否“讽谏”的标准“是屈而非宋,”<sup>[24](p71)</sup>远不是“屈宋”并列。只有到了齐梁,偏重“讽谏”的文学观念有所削弱之时,辞采华美的宋玉辞赋得到了肯定,沈约、刘勰、萧统等人才有了肯定性的“屈宋并称”评价。唐宋两代的屈宋评论,也有扬抑不同的声音。如王勃斥“屈、宋导浇源于前”,柳冕责屈宋“皆亡国之音”,李白、杜甫等才唱出了“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颂歌;至宋代,苏轼提出要“追古屈原、宋玉”,朱熹则高度

评价屈原“忠君爱国”而指斥宋玉为“礼法罪人”。可以说,在自司马迁至朱熹的大多数古人心目中,宋玉的文学地位,并不与“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屈原等同。

当代学者,也不仅游国恩先生有“宋不如屈”之说,姜书阁先生有宋玉无论立身行事还是文章辞赋“都不能与屈原并驾齐驱”之论;笔者以为,即使承认包括《楚辞》、《文选》、《古文苑》所载署名“宋玉”的全部十有余篇辞赋作品,亦未可与屈原《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二十余篇作品“等量齐观”。至于用屈原“发愤以抒情而作”比较宋玉“为示美以悦目、见丽以赏心而作”,而认为宋玉“在文学之为文学”这一方面甚至有超过屈原之处的论断也尚可推敲:因为所谓“诗言志”与“诗缘情”,只不过是批评家的诗学观念,并不能作为衡量诗歌创作水平高下的标准,当然也应该得不出“为文学而文学”的创作就一定比“发愤以抒情”或“言志”的作品更有审美价值的结论。诚如上述,则文学史著以“屈宋并称”推论宋玉有“与屈原并称的文学史地位”的判断,书面用语作出评价,尚须进一步论证和斟酌。

总之,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的宋玉书写虽长时期附论于屈原却又最终开始改变的历史,是值得回味和总结的。考察这一百余年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不仅有益于纠正长期以来宋玉未受到应有重视的学术偏见,对于今后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宋玉书写及其科学评价也会具有十分积极的启迪借鉴意义。

#### 参考文献:

- [1]陈玉堂.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M].合肥:黄山书社,1986.
- [2]吉平,黄晓静.中国文学史著版本概览[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 [3]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4]姜书阁.先秦辞赋原论[M].济南:齐鲁书社,1983.
- [5]姜书阁.中国文学史纲要(修订本)[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 [6]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

学出版社,1957.

[7]中国科学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8]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9]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0]赵明.先秦大文学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

[11]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2]蔡靖泉.楚文学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13]方铭.战国文学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

[14]褚斌杰,谭家健.先秦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5]方铭.战国文学史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6]徐北文.先秦文学史[M].济南:齐鲁书社,1981.

[17]王齐洲,王泽龙.湖北文学史[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

[18]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19]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0]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1936.

[21]张炯,邓绍基,樊骏.中华文学通史[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

[22]张炯.中华文学发展史[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

[23]方铭.中国文学史(先秦秦汉卷)[M].长春:长春出版社,2013.

[24]何新文.论洪迈与朱熹《高唐》《神女赋》的评价差异[J].中国韵文学刊,2011,(4).

责任编辑 邓 年